



ZHENGFU
SHICHANG YU QIYE

政府、市场与企业



卫志民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ZHENGFU
SHICHANG YU QIYE

政府、市场与企业

卫志民 /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侯俊智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市场与企业/卫志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01-014526-6

I. ①政… II. ①卫…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8153 号



政府、市场与企业

ZHENGFU SHICHANG YU QIYE

卫志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08 千字

ISBN 978-7-01-014526-6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是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创新项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背景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1
第一节 对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的衡量	1
第二节 对价格水平的衡量.....	11
第三节 对失业水平的衡量.....	19
第四节 对一个经济体国际经济联系程度的衡量	24
第二章 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与政府经济干预	27
第一节 稀缺资源配置机制.....	27
第二节 市场失灵与宏观经济政策	30
第三节 经济周期理论	34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	41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析	46
第一节 预算与财政收支	46
第二节 政府债务的真实后果.....	50
第三节 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析	57
第四节 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分析	61
第五节 政策时滞与自动稳定器	68
第四章 公共产品与外部性政策分析	72
第一节 公共产品与公地的悲剧	72
第二节 公共产品生产方式及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	77
第三节 外部性.....	86
第四节 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方案	93
第五节 针对外部性的公共政策	98

第五章 寡头垄断市场与产业组织理论	104
第一节 寡头垄断	104
第二节 寡头垄断市场中的竞争与合作	108
第三节 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	117
第六章 放松管制与反垄断政策分析	123
第一节 经济管制与社会管制	123
第二节 关于反垄断法的争论：企业行为与市场结构	126
第三节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	140
第四节 自由竞争环境中市场垄断的实际后果分析	152
第七章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及相关政策分析	157
第一节 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决定因素	158
第二节 贫困陷阱、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164
第三节 外来投资、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	171
第四节 教育与人口政策	177
第五节 技术进步与政策选择	184
第六节 制度性基础设施	192
第八章 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	197
第一节 产业政策	197
第二节 区域发展政策	204
第三节 中小企业政策和农业保护政策	210
第九章 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	215
第一节 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	216
第二节 制度质量的衡量	221
第十章 经济增长促进政策的国际经验	228
第一节 日本战后实施经济增长战略的实践与经验	228
第二节 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经济增长促进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235
第三节 后发展国家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分析	242
第十一章 限制性国际贸易政策的分析与比较	256
第一节 理解国际贸易活动的理论基础	256

第二节	限制性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分析	260
第三节	限制性国际贸易政策的目标与实际后果	270
第十二章	促进收入均等化与反贫困政策分析	281
第一节	收入、财富与资产	281
第二节	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	282
第三节	收入不平等衡量中面临的几个问题	286
第四节	反贫困政策	294
第十三章	政府失灵问题研究	299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	299
第二节	寻租、避租与创租	303
第三节	政府失灵分析	308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规则的引入	324
结 语		329
参考文献		331

第一章 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第一节 对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的衡量

GDP 的结构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衡量的的是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的规模。GDP 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GDP 也被看作是描述一个经济体经济福利状况最不坏的指标，因为 GDP 这个经济指标在被当作经济福利状况的衡量标准时有许多不完美之处。

经济统计学家主要通过产品流量法和收入流量法对一个经济体的 GDP 进行统计。按照收入流量法，GDP 可以被看作是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各种收入的年流量，如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等。按照产品流量法，GDP 被定义为一年中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因为是用商品的市场价格衡量的价值，所以称之为市场价值。

GDP 只包括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和服务，也就是说 GDP，只统计一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全部物品和服务中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部分，而不包括非法生产和销售的东西，也不包括在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和服务。GDP 只包括最终产品而不包括中间产品，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计算的问题。最终产品就是最终由消费者和投资者所购买和使用的那些物品，而中间产品只在生产者之间流动，不会被消费者和投资者所购买。但当中间产品在生产出来没有被使用时，这部分作为“存货”的中

间产品在计算 GDP 时就被暂时当作“最终”产品而算入 GDP 中了。在下一个年度，如果存货被使用了，存货量就减少了，这个年度的 GDP 也就相应地减少了。GDP 只包括在当年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包括在过去生产的物品，如旧货市场中的交易额就不会被计算进 GDP 中。GDP 衡量的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发生的经济活动规模，所以，无论生产者的国籍如何，其产出都会被计算进该经济体的 GDP。

一个经济体在一年中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 GDP (Y)，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消费 (C)、投资 (I)、政府购买 (G) 和净出口 (NX)：

$$Y = C + I + G + NX$$

GDP 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居民的个人生活消费 C，表现为生活消费产品和服务。GDP 中用于私人投资的部分 I，在实物上表现为该年度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存货、建筑物等耐用资本品，这些资本品能增加一个经济系统未来的生产能力。在统计上，居民购买新住房的支出被看作是投资性支出而不是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性支出。这个投资额也被称为国内私人总投资，是没有经过折旧调整的投资额。折旧指的是在一年中耐用资本品已经磨损或消耗掉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考虑折旧因素，我们就一定会夸大耐用资本品的增加，就好像只统计出生人口而忘记考虑死亡人口会夸大人口的增长一样。在一年中新投入的资本，即总投资，减去资本折旧后的剩余被称为私人净投资，净投资代表了这个经济体中资本存量的净增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所说的投资指的是实际投资，不包含金融投资。实际投资是指增加能够提高未来生产能力的耐用资本品和存货的行为，而购买股票、债券或储蓄这样的金融投资行为并不会形成新的资本品，只是将一种形式的金融资产转向另外一种形式的金融资产，仅仅涉及有形资本品所有权的转移。

GDP 的一部分被各级政府所购买。政府购买的物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军事产品、办公用品、基础设施、建筑物、报纸杂志、医疗服务等。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即政府部门进行的并不用来交换物品和服务的支付，如各种补助金、救济金、养老金、政府公债利息等，并没有改

变政府购买的规模。所以，不应该把政府的转移支付算进政府购买中。

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GDP 中的一部分产品和服务会被出口到其他经济体，即可能存在净出口。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净出口是一个负值，就说明存在一个净进口额，该经济体的 GDP 就会小于该国用于消费、投资和被政府采购走的物品和服务的总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GDP 代表的是一个经济体全部经济活动的增加值，而不是它的销售额，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它的出口额甚至会超过它的 GDP 的原因。

名义 GDP、实际 GDP 与潜在 GDP

由于 GDP 衡量的是一年中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所以，当一个经济体的 GDP 增长时，要么是因为这个经济体生产出了更多的物品和服务，要么是因为物品和服务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经济学家在统计 GDP 时关心的是经济活动实际规模的变化情况，而不是价格水平的变化。剔除掉价格因素影响的 GDP 就是实际 GDP，相对应地未加调整的 GDP 就是名义 GDP。名义 GDP 可以理解为按当年市场价格或名义市场价格统计出来的 GDP，实际 GDP 代表的则是按照不变价格（基年价格）统计出来的 GDP。也就是说，表示的是如果不同年份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都以一个相同的价格进行统计时，不同年份的经济活动规模。由于是以一个不变的价格进行统计，实际 GDP 就能真实地反映不同年份经济活动的相对规模和真实变化，而不会受到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就好像用一把固定长度的尺子去测量不同年份经济活动的规模。

名义 GDP 常常会因平均价格水平的波动而夸大或减小经济衰退或经济增长的程度。例如，在经济大萧条中，由于平均价格水平急剧下跌，名义 GDP 的下降幅度就会大大超过实际 GDP 的下降幅度。由于实际 GDP 真实反映了一个经济体满足社会成员各种需求的能力，所以，实际 GDP 能够比名义 GDP 更好地衡量这个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水平。在使用 GDP 这个经济指标时，如果不做特殊说明，指的均是实

际 GDP。

与实际 GDP 不同，潜在 GDP 指的是一个经济体所能维持的最大产出量。潜在 GDP 可以被理解为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均衡产出量，由这个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反映。实际 GDP 和潜在 GDP 通常是不一致的，潜在 GDP 也不是一个经济系统所能实现的最高产出。在战争期间或经济过热期间，在人和设备均处于过高负荷的状态时，实际 GDP 就能超过潜在的 GDP。但这样的高利用率是不可持续的，否则会带来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 GDP 低于潜在 GDP。当潜在 GDP 高于实际 GDP 时，就出现了 GDP 缺口。当二者之间的缺口不大时，我们把这种经济下降称为经济衰退，当缺口迅速扩大时，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当这种巨大缺口长时间地保持时，就说明这个经济体陷入了经济萧条。

根据名义 GDP 和实际 GDP，可以计算出 GDP 平减指数。GDP 的平减指数等于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比值。GDP 平减指数和 CPI 一样，也是一个价格指数，只不过衡量的是不同年份国内生产的所有物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根据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年份的实际 GDP，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该经济体的 GDP 在不同年份的增长率。所有经济体实际 GDP 的变化特点都是不稳定的，但努力使本国的经济系统尽可能平稳地运行和尽可能健康快速地增长是所有国家政府追求的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净值和国民收入是与 GDP 关系紧密的几个统计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指的是一国永久居民在一年内所获得的总收入，或一国居民在一年内使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产值。GNP 与 GDP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包括本国居民在国外获得的收入，但不包括外国居民在本国获得的收入。国内生产净值（NDP），指的是一国的 GDP 减去折旧后的剩余部分。由于折旧部分难以被准确地估算，而准确地统计总投资额则要容易得多，所以，虽然 NDP 能比 GDP 更精确地反映一个经济体实际的经济规模，但我们还是更多地使用 GDP 这个指标。国民收入（NI），指的是一国居民在经济活动中赚取的收入总和。GDP、GNP、NDP、NI 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

统计口径虽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但它们描述和衡量的是同一个经济体的总体状况，因此它们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当 GDP 迅速增长时，其他指标也是迅速增长的；当 GDP 减少时，其他指标也是减少的。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反映的是经济规模的变化，是一个含义比较单纯的量的概念，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的增长幅度。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综合性的质的概念，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途径、效率和代价，体现的是这个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演进方向上所取得的进步，即质的提高。不能把经济增长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一定能带来社会成员平均福利水平的改善，经济增长也不是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如果是建立在涸泽而渔式的资源浪费和牺牲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就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与经济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如同其字面的含义，指的是一种能够持续下去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既能满足当前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又不以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通过制度创新来真正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繁荣指数由英国智库列格坦（Legatum Institute）编制。列格坦是英国伦敦一家致力于促进“人类尊严、自由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库机构。列格坦的年度世界繁荣指数排名是从 2007 年开始的，所使用的主要数据均来自著名的全球数据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列格坦繁荣指数的编制主要参考 9 个方面：经济基础、企业发展与创新能力、民主制度、教育、健康、社会安全、政府管理、个人自由以及社会资本。在繁荣指数的编制中，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繁荣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参考因素。繁荣指数更加强调考察一个经济体的自由程度、社会安全、政府治理、生活的自我控制、健康、休闲时间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才是实现社会可持

续繁荣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繁荣与幸福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都使用该指数反映一个经济体国民的幸福水平。在 2012 年全球繁荣指数排名中，在 142 个参与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挪威、瑞士、加拿大、瑞典、新西兰分列前 5 位，中国位列第 55 位。

GDP 与经济福利水平

通常，使用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 GDP”这个指标来描述不同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不同经济体在人均 GDP 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异和他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异一样巨大，人均 GDP 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 GDP 的高水平导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尽管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国家不会机械地等同于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

人均 GDP 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最不坏的指标。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有很多，经常使用的有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①、儿童营养不良率、产妇死亡率、儿童入学率、能够得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人均铁路和公路的长度、百人均电视机和电话的数量、上网人口的比例等。但这些指标均与人均 GDP 水平高度正相关。目前尚无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能比人均 GDP 更好地描述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GDP 原本就仅仅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的指标。

完美主义者经常激烈地抨击这个衡量标准，认为这样的评价标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些更值得关注的目标或事物上转移开了，把我们的注意力狭隘地固定到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上。完美主义者认为，比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快乐、稳定的婚姻、宁静的心灵、闲适的生活、洁净的环境、廉洁的政府、高尚的义工。他们甚至主张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和“国内污染总值”来取代 GDP 或 GNP。

① 每 1000 个活着的婴儿中在过第一个生日之前死亡的比率。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极富吸引力的，可以轻松地赢得掌声和赞美，但却经不起冷静的推敲。他们甚至无法明确地说明 GNH 应该如何进行计算。他们激进言论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醒我们注意不要片面地追求 GDP 的增长，但这主要不能依靠呼吁，而只能依靠能够及时、充分、真实、准确反映社会成员意志的政治体制。

GDP 只能将那些通过市场交易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统计进来，这就意味着 GDP 会忽略许多东西。但我们必须明白，那些东西之所以被 GDP 忽略，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难以被量化，难以被计量。GDP 只是对一个经济体经济活动规模的描述，而不是指导经济活动的准则；GDP 所包含的内容是透明、清晰的，而不是一个难以察觉的圈套。如果我们忽视了那些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忽视了，而不是因为存在 GDP 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统计指标的缘故，更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 GDP 这个统计指标的诱导和欺骗。我们追求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不论是对物质产品的需要还是对经济增长率的政治需要，总归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反思，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确保我们做出的公共选择反映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真实意愿，反思我们做出的私人选择是否真正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GDP 有助于我们得到那些似乎与 GDP 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东西，GDP 增加了我们获得这些宝贵事物的能力。GDP 的增长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快乐，但维持经济落后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会快乐，恬静的田园生活更多是一种由文学作品创造出来的浪漫景象，而未见得是生活在过去那个世界人们的真实感受，和饥寒、病痛、专制联系在一起的是痛苦而非快乐。为了追求个人收入的增长，我们有时确实是过于劳累和忙碌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挣扎在生存线上而别无选择。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来看，我们的闲暇时间与生活质量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GDP 的增长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健康，但经济落后更不能够保证我们一定健康。经济发展使我们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治愈许多曾经

的绝症，也使我们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医疗服务，我们的预期寿命现在大大延长了。GDP 的增长也许使我们的婚姻不那么稳定了，但美好旧时代的稳定婚姻很难说是人们自愿的选择，稳定的婚姻也不是必然与人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增长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但我们不会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就不应该对因为感情因素而导致的离婚率上升过分担心。真正需要我们担心的是那些因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如不合理的制度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而导致的离婚行为。

GDP 的增长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获得更多的艺术杰作，但 GDP 的增长却使我们的国民更有能力和机会去欣赏和创造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这些杰作减少了，不应责怪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损害我们从事这些创作活动的的能力。艺术杰作减少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想这样做了，或是因为我们的审美情趣没有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许我们总是过于喜欢那些距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的东西。

GDP 的增长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正义、诚实、忠诚、和平和爱，但在一个人们不再需要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而担心的时代里，这些珍贵的品格和美好的气质更容易被养成。

GDP 的增长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在有的社会中，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享有大量的财富，普通民众则被压迫和奴役，只拥有非常有限的政治自由和物质财富。但经济停滞也不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就一定会更加平均。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可供这些国家运用现代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系统进行再分配的国民收入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初次分配偏离效率的轨道，不仅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反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受到扭曲和压制的后果。二次分配不能促进公平，是如何完善再分配制度的问题，而不应归咎于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也不是一定要造成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尤其对于后发展国家，他们不需要重新认识某些经济活动可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先发展国家已经为他们做出过演示了，支付过学费了。今天发展中国家为他们取得的经济进步所支付的巨大代价，根本不是不

可避免的，尽管后发展国家必须要为经济增长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环境灾难更多是因为他们生产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经济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造成的。

GDP 的局限

由于绝大多数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我们通过市场价格来测度产出品和投入品的市场价值。但在没有进行直接交易的情况下，物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价格就不会存在，如政府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警察部门、海关、司法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来代替它的市场价格，这样做无疑会低估这类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GDP 也无法将非市场的经济活动统计进来，从而造成对实际经济活动规模的低估，如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同样，当非市场活动转变为市场活动时，GDP 的增长又会高估我们实际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例如，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许多原先在家庭内部生产的服务和物品，逐渐由企业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替代了，像幼儿看护、烹饪、洗衣、家庭清洁这样的服务和食品、衣物这样的物品。

GDP 也无法反映闲暇时间增多和舒适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好处，这一特征限制了 GDP 作为生活质量衡量标准的准确性。我们工作所带来的产出被记入 GDP，但我们享受的闲暇却无法记入 GDP。闲暇对于我们来说同工作一样重要，否则我们会完全用工作来取代闲暇。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成员每天工作 6 小时就能够生产出另外一个经济体成员每天工作 12 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的 GDP，那么，这两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虽然一样，但生活质量却大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比起上一代人要舒适的多，轻松的多，但这一点却难以体现在 GDP 的统计中。

GDP 无法完全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改进，除非这种改进能在价格上有所体现，所以，GDP 有可能低估了因产品与服务质量改进而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GDP 统计的一些经济活动常常是为了避免或遏止

那些诸如犯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坏事发生，这些产出并不能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如防盗窗、大铁锁和警察保安这些方面的产出。GDP 只反映社会成员的货币收入，而无法反映社会成员的“精神收入”^①，从而会低估实际福利水平的变化。

GDP 无法充分地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综合实力。GDP 是反映一个国家硬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但无法真实反映一个经济体的软实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由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和由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的吸引力以及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族的凝聚力、国民形象的亲和力、外交政策的正当性表现出来的软实力共同构成。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或利诱的方式来引导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能力。

GDP 无法反映环境的污染状况。用来保护环境的活动会被记入 GDP，但环境污染本身并无法从 GDP 中扣除。GDP 反映的是产品的市场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对于有些商品，它的市场价值大于其真实的社会价值，它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该产品的社会价值应该是市场价格减去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额，否则就会使以 GDP 表示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实际的社会福利水平。GDP 无法反映产出构成的变化，从而也无法反映产出构成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在 GDP 规模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更多的黄油和更少的大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究竟意味着增加、减少还是不变呢？GDP 无法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分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要求 GDP 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分配状况。GDP 无法反映政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改善。有的时候，人均 GDP 相同的经济体在政治自由度和社会公平方面差距很大，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将因此而差距巨大。虽然我们不能要求 GDP 反映政治自由程度和社会公平程度，但我们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是想提醒不要用 GDP 的增长来掩盖或取代政治自由和社会公平方面的目标。汇率因素也使实行管制汇率国家的 GDP

① 如某个工作机构里良好的工作氛围所提供的效用。